

略论美国经济军事化的 作用和反作用

刘 颂 羯

一、经济军事化的相对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国民经济大规模地转上了军事化轨道，庞大的现代化军火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成为美国经济中的固定组成部分。

这种军事化经济是现代军国主义的必然产物。它是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军国主义趋于蓬勃发展才出现和存在的。它的经济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垄断。列宁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192 页）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经济军事化的程度最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年中，美国军费支出总数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高达一万六千亿美元。它的庞大的经济军事化规模，可由下列指标来说明：（1）历年美国军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三年，美国军费支出平均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为百分之八点一，（2）目前美国军火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3）美国工业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参加军火生产，（4）依靠军事机关和军火生产为主的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百分之十二。下面，我们就以此为背景，对美国经济军事化的作用和反作用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经济军事化的特殊作用

经济军事化有促进经济增长率的特殊作用。按照列宁的观点，经济军事化已经不是“纯”资本主义了，而是国民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52 页）首先，军火工业不是一般工业部门，它凌驾于一切工业部门之上。列宁曾经指出：大资本，首先是最大的垄断资本，是在“‘重工业’向其他一切工业部门收取贡税的条件下活动的”。（《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209 页）在收取贡税这方面，军火工业实际上比一般重工业更加突出。

大家知道，再生产周期过程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竞争规律不断迫使资本家去更新和扩大固定资本，以便降低生产费用。在经济军事化条件下，美国军火商在源源不断的军事合同的刺激下，甚至在危机期间也继续进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活动。重要的是这一点，即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合同已经成为美国工业中固定资本新投资资金的稳定来源。例如：在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年代的 1965 年至 1969 年，美国国防部与美国共同订立

的军事合同，正占美国公司用于固定资本投资合同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见：维克托·佩洛：《不稳定经济》第173页）

美国联邦政府为军火商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各种优惠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国家预算，为军火商提供生产成本。即给予军火工业为期五年的加速折旧提成的权利。加速折旧不能反映固定资本的实际损耗，因为美国一般固定资本折旧期限为八至十年，这样，加速折旧实际上提高了军火商的利润率。

不仅如此，军火商还无偿地使用属于国家的固定资本。有人对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十三家最大的美国军火商的固定资本进行分析，表明它们的固定资本的半数以上是属于国家提供的。军火商无偿地使用它，而国家每年还要拨出专款进行维修和更新。

联邦政府还为军火商提供生产资本的另一成分，即流动资本。如原料属于流动资本的范畴，对一般民用工业来说，始终是供不应求的。对此，联邦政府也规定原料必须首先满足军火工业的需要，并建立一种储备多达九十五种以上的战略物资的制度。

生产人员是生产过程的另一重要因素。根据公开材料，美国工业中从事研究与发展的全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根据国防部和宇宙航行局的合同而工作的。

此外，联邦政府还为科学研究进行大量拨款。六十年代，政府这项拨款的比重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大部分用于军事项目。因此，在美国，许多科学技术的新发明都是在经济军事化的条件下获得的。军事技术“溢出”到民用生产，不仅降低了生产费用，扩大产品品种，同时还改进了产品质量，以及缩短了新技术的出现与推广普及之间的时间间隔。

同时，军火市场也不是一般的自由市场，而是长期的有保证的国家市场。这是因为：（1）军火商主要不是为市场“工作”的，而是为国家的军火采购而工作的。一般都占整个国家采购的百分之八十。（2）现代武器制造复杂，从设计蓝图到最后研制成功，时间拖得很长，例如美国武器系统的生产时间往往需要五年至十五年不等。（3）现代军事技术迅速进步，武器的无形损耗很快。据估计，美国每年都有十分之一的武器和装备需要更新。

另一种经济军事化的特殊作用是毁灭一部分物质生产力，实际上起着缓和危机的作用。

军火生产不是一般商品生产，它是特种商品生产。从经济观点看，军火生产不断地把大量物资排除在再生产过程之外，这就是毁灭物质生产力的一种形式，实际上也是国民收入的一种扣除。由于军火生产的这种特性，它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暂时地局部地缓和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之间日益尖锐化的矛盾，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危机因素的积累，缓和危机的深度，推迟危机的爆发，等等。实际上起着缓和危机的作用。因为，从一般说来，为了摆脱危机，必须把资本的一部分非生产性地浪费掉，或消灭掉，如在危机期间，把牛奶、咖啡、小麦倾倒入海，把大量棉花烧毁。而从美国战争经济来说，这就如同在战场上消耗大量军火。例如美国侵越战争期间，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期间，美国耗费了空中军火六百八十吨，地面军火七百三十万吨，总值在二百八十亿美元以上。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战争就其直接的经济意义来说，就如同一个国家把它的一部分资本投入水中一样。

其次，为了准备未来战争，大力扩充军备，并且建立战略储备系统，大量军需物资

堆集在仓库中。根据统计材料，美国的军事存货价值高达二千一百亿美元左右，占国防部全部财产的一半以上。（东德《经济周报社》1975年第102页）实际上，这也是物质毁灭的一种形式，它使物质在实际上不再发生作用。

可见，经济军事化或者战争，和经济危机起着十分类似的作用，但是，经济危机和战争又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列宁指出：“危机和战争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别的现象，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和不同的阶级意义。”（《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2页）

由于经济军事化在一定时期内对再生产过程具有两种特殊作用，所以，经济军事化便被当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危机措施，来对抗周期波动。可以举出美国把侵越战争升级，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推迟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危机爆发的例子。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危机后，生产沿着上升方向发展，但美国工业生产在一九六六年第四季度又开始缓慢下降，直到一九六七年。这个期间，联邦政府的军事采购迅速增长，自一九六四年的二百七十一亿美元激增至一九六六年的三百九十七亿美元。结果，军事采购的需求代替了投资和消费支出增长的需要。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危机的爆发被推迟了。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美国国民经济重新开始了新的普遍增长，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九月，在侵越战争中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这在危机史上是不平常的。可以说，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危机实际上就是推迟了的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危机的重演。

三、经济军事化的反作用

由于扩大国家支出，大量采购军火，在实现军火商的剩余价值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因为同这种军火出售有关的，只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军火商看来，“产品只要卖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89页）

但是，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军火生产则具有两重性，它既有上面提到的积极的特殊的作用一面，也有消极的反作用的一面，这是战争经济现实中矛盾的两个侧面。

首先是降低经济发展的总的速度。

由于军火生产的特性，引伸出来一种执行全机职能的特殊作用，它不断地把物资排除在再生产过程之外，造成大量物质生产力的毁灭，从长期观点来看，它必然会降低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就使得经济军事化所造成的“繁荣”，只是暂时的效果，是虚假的“繁荣”，不能持久的。

美国经济军事化在五十年代前半期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对促进工业生产增长等方面，肯定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强大刺激后的一段时期则明显地起着反作用趋势，总的经济增长率是很缓慢的。

美国是拥有大量剩余生产能力的国家，但在经济军事化的长期重压下，它的工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缓慢的。经济军事化对缺少后备资源的英国，显然具有更加不利的影响，相反，军备较少的日本却是长期地高速度地发展。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五年，日本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比美国高三倍，比英国高五倍。（见表一）

其次、加强了危机频繁的历史趋势。表现在下列三方面：（1）加剧了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调。长期以来农业生产更加落后于工业生产，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

美国、英国、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表一

	美 国	英 国	日 本
1951—55	5.0	4.0	16.7
1956—60	2.7	2.5	15.7
1961—65	5.9	3.2	11.7
1966—70	3.6	2.3	16.3
1971—75	1.6	0.6	2.0
1956—75	3.4	2.1	11.2

见东德《国际政治和经济公报》1978年第2期第18页。

七七年，美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三，农业生产仅为百分之二点二。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不平衡，具有军事意义的工业部门片面地膨胀起来。(2) 劳动人民贫困化进一步加剧。美国庞大的军事支出依靠政府抽税来弥补。因此，美国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近年来，虽然个人所得税因提高纳税起征点有所削减，但社会保险税却增加非常迅速。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在业工人的名义工资有所增加，但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和纳税后，工人的工资收入往往降低很多。另方面还必须看到，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总是工资的调节器，使工资经常处于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同时，工人阶级在经济周期各个阶段的工资收入不同，高涨阶段时稍高，危机阶段时急剧下降，如果把工人阶级在整个经济周期内一切工资收入平均计算起来，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还是下降了。(3) 促进了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经济军事化和通货膨胀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这是因为联邦政府一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例如自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度至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度的三十一年中，就有二十三年的财政支出出现赤字，赤字总是高达二千八百七十六亿美元。这种预算赤字是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造成的。为了弥补预算赤字，联邦政府追加发行货币，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这种情况造成了通货膨胀。

在这里，公债和通货膨胀之间是特殊地联系着的。至一九七七年底，公债已高达七千一百五十三亿美元。因为很大一部分公债在银行系统中推销，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它们并不反映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实际需要，因而使得通货膨胀加速发展。

上述经济军事化三个方面的反作用，不仅互相交错在一起，而且互相促进对方的发展，加强了危机频繁的历史趋势。如：美国经济军事化造成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刺激了物价上涨，于是许多投机商人纷纷进行囤积，使得现有库存，生产同消费之间的关系更加混乱。加上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需要进行再分配，这就导致比例关系失调的加深。同时，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本家又作为剥削劳动人民的补充手段。由于贫富鸿沟日趋扩大，又促使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消费能力之间矛盾尖锐化，以致于影响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结果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现象越发加剧了。

这种种情况表明：经济军事化的反作用不断地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日趋激烈，终于降低了总的经济发展速度，加速了危机前提的成熟。分析经济军事化错综复杂的反作用，就为我们了解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提供了一把钥匙。

四、经济军事化的一定限度

任何非生产性开支都有它的一定的经济限度。

一九六九年十月，美国爆发了危机史上不平常的战争中危机。战争，由于它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本来是可以清除生产过剩危机的前提的。但是，危机终于在侵越战争的条件下爆发了，也就明确地暴露了经济军事化的一定限度，宣告了联邦政府奉行几十年的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的总破产。

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危机不是一般常见的经济危机，它的显著特征是生产过剩危机和财政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用语，就是“双重危机”。

在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危机中，最尖锐的问题发生在流通领域。在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条件下，全国公私债务迅速上升。在总债务中，短期债务占一半以上，企业的清债能力急剧下降，股票价格出现了三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大暴跌。这次财政金融危机在国际上，就是美元霸权地位和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破产。美元被迫脱离了黄金基础。大量贬值的美元流入其他国家，成为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特殊形式。目前在国外“游荡”的美元已高达六千亿美元，造成世界货币市场的混乱。

可以说，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危机是美国经济的转折点。危机过后，又陷入长达一年的萧条阶段，高涨阶段很短，仅有二十个月。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又爆发了三十年代以来最长最严重的“双重危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生产急剧下降，大规模失业现象与和平时期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危机导致财政状况恶化，震撼了信贷系统，货币动荡加深，而且由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使资本再生产的价值比例受到很大破坏。这种“双重危机”是特别难以摆脱的。一般来说，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政府总是采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放宽信贷等膨胀政策，来人为地刺激经济。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加重了财政金融危机。反过来，日趋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又加深了经济危机。在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条件下，资本家在危机期间仍然进行投机囤积，这样一方面抑制了工业生产的下降速度，另一方面是阻止了库存的清散，这样就使得无机职能不能充分地发挥，即消灭一部分资本来恢复利润率，以致于不能达到一种强制性恢复平衡的作用。

结果是危机的后果至今没有完全消除。一九七六年，美国固定资本增长速度仍比七十年代危机前的二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要慢百分之三十四，美国经济中出现了罕见投资过程的停顿现象。直到一九七八年第二季度，美国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仍然高达百分之十点七，这是三年来最高的指标，失业率仍然保持在高水平上，达到百分之六点五。对此，联邦政府的任何政策都不能行之有效，总是顾此失彼，它只是从相反方向来“健全”经济，即一方面对通货膨胀的后果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与苏联争坝日趋激烈，军备竞赛，有增无已，不断产生预算赤字，这又是加强了通货膨胀的原因。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种局面称为“停滞下的通货膨胀”，按照恩格斯的用语，就是经常的停滞加上一些轻微的波动，成了工业的常态，对于持久经济军事化造成的严重病症，世界上没有一个医生能开出好的药方来医治这不治之症。